

楚风汉韵文库

新时期以来 湖北女作家与地域文化研究

XINSHIQI YILAI
HUBEI NUZUOJIA YU DIYU WENHUA YANJIU

马 英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楚风汉韵文库

本书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方言文化研究中心项目“当代湖北女作家与水文化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2014FYY018）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重点学科群研究成果

新时期以来 湖北女作家与地域文化研究

XINSHIQI YILAI
HUBEI NUZUOJIA YU DIYU WENHUA YANJIU

马 英 /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以来湖北女作家与地域文化研究/马英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楚风汉韵文库)

ISBN 978-7-5622-7984-6

I. ①新… II. ①马… III. ①女作家—文学创作—关系—地方文化—研究—湖北 IV. ①I206.7 ②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572号

新时期以来湖北女作家与地域文化研究

©马英著

责任编辑: 裴美莹 张晶晶

编辑室: 高校教材编辑室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销售电话: 027-67861367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印刷: 武汉华工鑫宏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200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定价: 25.00元

责任校对: 肖绪旭

封面设计: 胡 灿

电话: 027-67867364

邮编: 430079

邮购电话: 027-67861321

电子信箱: press@mail.ccnu.edu.cn

督印: 王兴平

印张: 11.75

印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湖北女作家创作概览	(5)
第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时期“女儿”的歌声	(5)
第二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新眼睛”里的“新现实”	(9)
第三节 20 世纪 90 年代:“二梅”吐芬芳	(12)
第四节 绚烂多彩的 21 世纪	(16)
第二章 湖北女作家与“水”文化	(21)
第一节 “水乡”情怀	(23)
第二节 “水性”意象	(31)
第三节 “水样”女性	(45)
第三章 湖北女作家与武汉文化	(60)
第一节 里份:历史沧桑与俗世安稳	(61)
第二节 街道:商业文化的集中表现	(68)
第三节 码头文化的集中表现	(73)
第四节 革命文化的多重书写	(80)
第五节 “东方芝加哥”的别样风情	(94)
第四章 湖北女作家与荆州文化	(103)
第一节 王芸小说的民间关怀	(103)
第二节 王小木的“笼子”情结	(112)
第三节 宋小词的乡村书写	(120)
第五章 湖北女作家与鄂西文化	(128)
第一节 叶梅与土家文化	(128)
第二节 姚鄂梅的三峡书写	(139)

余论·····	(154)
附录一 湖北青年女作家王芸访谈录·····	(156)
附录二 湖北青年女作家郭海燕访谈录·····	(161)
附录三 湖北青年女作家姜燕鸣访谈录·····	(166)
附录四 湖北青年女作家姚鄂梅访谈录·····	(171)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84)

绪 论

湖北人杰地灵，丰富多彩的湖北文化滋养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作家。本书以湖北女作家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新时期的文坛，湖北女作家曾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湖北女作家方方和池莉从湖北走向全国，让人欣喜而骄傲，湖北文坛甚至一度被认为“阴盛阳衰”。另一方面，在池莉和方方的引领之下，更多的湖北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进入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视野。比如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叶梅，60年代出生的青年女作家姚鄂梅、阿毛、姜燕鸣，70后、80后作家王小木、王芸、汪静玉、郭海燕、李榕、桢理、冯慧、苏瓷瓷、童喜喜、宋小词……她们分散在不同的创作领域，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领域都能看到她们精彩的表现，可以说各展风采、各显风格、各具特色，同时又彼此呼应、互为补充，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作家队伍，即便是放在全国的女性文学格局中也十分引人注目。她们的创作已经成为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有些女作家在多年的创作中一直保持了强健的创作势头，比如姚鄂梅等；还有一些女作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出手不凡，比如宋小词等。她们给湖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带来了巨大的欣喜。

本书以湖北女作家为研究对象，还有一点需要厘清。那就是何为“湖北女作家”？在迅猛发展的当下社会，作家的流动性也越来越大。像传统农耕社会那样长期偏安一隅的作家并不是很多，作家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走、上下求索，所以本书所指称的湖北女作家并非是一定要长期居住在湖北的女作家。本书所指称的“湖北女作家”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常驻湖北省内的湖北籍女作家，比如方方、魏光焰、姜燕鸣、郭海燕、李榕等；还有一种是常驻外省的湖北籍女作家，这个群体更大一些，比如池莉、叶梅、姚鄂梅、王芸、王君（王小木）、宋小词等，均在本书的言说范围之内；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湖北居住并产生了以湖北为写作背景的作品的部分非湖北籍女性作家，比如林白，用鄂东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产生较大反响，这类女作家也是本书需要研究的对象。

湖北女作家数量庞大,本书之所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是因为众多湖北女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带有地域特色,由于论题的缘故,本书所涉及的湖北女作家大多具有“湖北情怀”。有些作家具有非常浓郁的地域意识,比如方方,她的小说大多是以湖北为写作背景的,尤其是以武汉为背景。在谈到武汉时,她总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写了许多有关武汉的散文,如《武汉这个地方》《武汉人说话》《武汉人过早》《武汉人的性格》等,内容非常丰富;她对武汉的历史亦有着浓厚的兴趣,还专门创作了《武昌城》《民的1911》等涉及武汉历史的小说。她曾经说:“我觉得这个城市对我而言,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她的作品中到处都散发着这座城市的气息。与之相似,池莉也是如此,她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以武汉为背景、表现武汉人生活的小说,如《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来来往往》等。还有许多“汉味作家”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之后将详细论述。土家族作家叶梅也是地域意识非常强烈的湖北女作家之一,从鄂西走出来的叶梅也坦言:“我的成长和三峡文化的滋养分不开。”^② 读过叶梅小说的人同样也会发现,她的很多小说中都弥漫着三峡文化的气息,她写得最好的形象最丰满生动的也是那些具有“峡江性格”的人们。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中,王芸对荆楚文化情有独钟,有着非常明确的书写荆楚文化的意识,她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楚文化的散文,比如散文集《穿越历史的楚风》等。在小说领域也收获颇丰,比如《红袍甲》《半家冢》《铸剑》等。王芸坦言:“随着年岁渐长,目光开始往回收,向内收,也越发地意识到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③ 此外,还不得不提的是出生在湖北松滋的80后作家宋小词,其《血盆经》《声声慢》等作品均带有地域文化的特点。宋小词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自然天成、弥足珍贵。有些作家则是在远离故乡,有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比照之后,在对故乡的回望中悄然而生地地域意识,比如叶梅,她早期创作的作品地域意识并不明显,而她到《民族文学》杂志工作以后创作的作品则具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因此其创作中的地域文化因子是在远离故土的基础上产生的。令人高兴的是,叶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根,此后其创作基本上没有脱离鄂西文化。

还有些女作家地域意识并不是很强烈,然而由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原因,

① 方方:《我的城市我的文学》,《图书情报论坛》,2007年第3期。

② 叶梅:《我的文学创作与三峡文化》,《图书情报论坛》,2007年第2期。

③ 见附录一。

地域文化还是深深地影响着她们的创作。比如姚鄂梅,虽然她并没有集中笔力去书写她所熟悉的故乡,但是她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中依旧能见到故乡的影子,有的小说有意无意就有了移民情结。所以她也不得不承认:“湖北给我的记忆是铭心刻骨的……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来自湖北的外地人,我的记忆是属于湖北的。”^①“家乡和童年记忆,是我人生的基调,是写作的无尽源泉。”^②许多难以忘却的童年记忆深深地影响了她的创作。不排除地域文化会以“随风潜入夜”的方式“在我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出来”^③。再比如王君(王小木),她小说中的叙事套路就受到荆州民间文化的影响。湖北地域文化对这些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有大有小、有显有隐,但正是这些地域文化的滋养,使她们小说中的意蕴显得更为丰厚,也更耐人寻味。研究这些小说中的湖北文化因子,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同时,本书还需厘清何为“湖北文化”。“湖北”这一名称源起宋代,其所指涉的行政区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几度发生变化,加之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更是呈现出驳杂的色彩。周积明先生曾经指出:“‘湖北文化’事实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湖北文化’包括在今湖北境内发生的所有文化遗存、文化现象以及文化运动;狭义的‘湖北文化’则强调以湖北这一行政区划为依托的有自身独特文化格局的文化体系。”^④基于此,本书采取狭义的概念。本书所涉及的地域文化多为本土独特文化。由于湖北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各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因此作家有关地域文化的书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目前一般将湖北作家按区域特点进一步分为鄂东作家群、鄂西作家群、江汉平原作家群和“汉味”作家群^⑤。这种区分主要是就整个湖北作家而言的,若是以这种划分来考量湖北女性作家,就不难看出:各地区分布的湖北女作家水平参差不齐,在地域文化书写方面的关注点也非常不同,所以本书的研究不能照搬这种划分方式。

① 姚鄂梅:《我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姚鄂梅访谈录》,《文艺新观察》,2007年第4期。

② 姚鄂梅:《家乡和童年记忆:是我人生的基调》,《三峡晚报》,2017年3月4日。

③ 见附录二。

④ 周积明:《湖北文化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⑤ 阳燕:《世纪转型期的湖北小说研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5页;另参见黄道友:《地域文化与新时期湖北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本书从湖北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出发,分为“武汉叙事”“荆州叙事”“鄂西叙事”“鄂东叙事”。具体说来,池莉、方方、魏光焰、姜燕鸣、李榕等集中参与了“武汉叙事”,她们的小说更多地呈现出“汉味”叙事的特点;王君、王芸、宋小词等主要进行的是“荆州叙事”,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甚至也可以将汪静玉的小说囊括进来;叶梅、姚鄂梅则是“鄂西叙事”,特别是叶梅对土家人生活的描绘,别有风味。从遥远的广西迁至武汉的林白,虽没有写出具有“汉味”特点的作品,但她的《妇女闲聊录》以口述实录的方式描写鄂东一隅——“王榨”人和事,在“原生态”的日常闲聊中折射出鄂东人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展示了鄂东人芜杂、热烈、活泼的生命状态,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可看作“鄂东叙事”的典范。如果说“武汉叙事”重在写都市生活,那么“鄂东叙事”“荆州叙事”“鄂西叙事”则重在写乡土;如果说“荆州叙事”浸透了水乡的灵性,“鄂西叙事”则烘托出山林的浪漫。本书拟从水文化、武汉文化、荆州文化以及鄂西文化四个方面来考量湖北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因鄂东叙事类的女作家作品目前还不多,暂不作专章论述。

湖北女作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除了这些在作品中表现地域文化的作家,当然还有一些作家超越了地理的限制,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她们的小说中并不明显,她们的写作逐步超越单纯的乡土意识,而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现实社会,关注底层、关注焦点问题、关注人性等。还有一部分女作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成为网络作家,比如紫百合(刘敏)就写了《荆棘舞》《兰陵相思赋》《西京水龙吟》《花落燕云梦》《香浮》《唐宫外传》《猎爱全城》等,可以划分为职场小说、穿越小说、言情小说、玄幻小说等,几乎涵盖了网络小说的主要类型;还有千里烟的“爱情三部曲”(《爱情豆豆》《期货爱情》《爱情出口》)等,这些作品都是先在网上连载后出书的,其中《爱情豆豆》还荣获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冠军。我们还是可以从她们的上述作品中感受到新生代女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的丰富体验与无尽困惑。这些不同的写作题材丰富了湖北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使湖北文坛呈现出更加斑斓的色彩。不过这些作家的创作与地域文化关联不大,因此本书论及甚少。

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湖北女作家创作概览

新时期以来的湖北文坛因为女作家的灿烂绽放而变得更为精彩。新时期之初，姚雪垠、鄢国培、刘富道等创作的中长篇小说使湖北文坛在全国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然而辉煌之后却是一段难挨的沉寂，方方和池莉在1987年的“一鸣惊人”给文坛带来无限惊喜。1987年是湖北女作家最值得骄傲的一年，两位女作家的闪亮登场使湖北文坛再度辉煌，她们也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作家，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尔后她们展现了强劲的创作势头，特别是方方，至今还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每年都有作品面世并产生一定的反响。20世纪90年代的湖北女作家群体因为叶梅的成名而变得更加绚丽，她独特的写作题材与文化意识使湖北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方方作为率先成名的湖北女作家之一，非常注重发掘和培养新人。在方方等前辈的精心呵护之下，新世纪的湖北女作家群体人才辈出，以姚鄂梅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延续了湖北作家关注现实的传统，展现了湖北女作家群体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女儿”的歌声

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与政治文化语境相关。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政治宣传口号，于广大中国人民而言，不堪回首的历史终于成为过去，新的历史时期终于到来。文艺界也开始“解冻”，结束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创作局面。面对曾经给祖国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伤痕文学”率先描写了“十年浩劫”中极左政治路线对人的深刻异化和摧残。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样，“改革文学”也充分表达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小说中所表现的政治、伦理或现实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一阵又一阵的轰动效应。一时间，整个文学界可谓波澜壮阔、热闹非凡。在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湖北女作家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以小女儿的情怀进行着她们的“青春写作”。

20世纪80年代初，池莉和方方正值二十多岁的“好年华”，当时池莉还在武汉钢铁厂医务处做流行病医生。1983年，她考入武汉大学成人班；方方是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1982年毕业后在湖北电视台任编辑。无论是年龄，还是人生阅历、生活环境，两人都是相对单纯的。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池莉、方方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抵是符合男性世界的规约的。她们早期的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那个激情年代所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尤其是池莉，其早期小说具有传统女性文学的特点，如池莉所言：“我最初的小说据说写得清新美好。”^① 纵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也的确是清新美好的，无论是《月儿好》还是《有土地，就会有足迹》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池莉所言：“我写一个男人被他抛弃的女人感动，因为这女人被抛弃之后依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她的善良。我写一群知青如何相互爱护地在一块儿生活，如何大公无私。”^② 小说基调是积极向上的，充满了亮丽的色彩。《有土地，就会有足迹》中的秋伟宜朴素、善良，具有奉献精神。虽然深爱着吕炜，但她没有向吕炜表露自己的爱慕，因为她知道“一个高尚纯粹的人应该懂得目前生活的主题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想那个未免为时过早”。秋伟宜一心要做一个“高尚纯粹”的人，个人恋爱哪有国家的号召重要，于是她把爱深埋心底。两年之后，还在一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秋伟宜突然发现吕炜已经有了恋人，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的是写诗，独自一人“回味自己忠贞而无望的爱情”，显示了一个“高尚纯粹”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无私奉献的本质。吕炜一旦失恋，秋伟宜立马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用自己“慈母”一般的胸怀接纳、抚慰恋人受伤的靈魂。当得知吕炜的失恋是一场误会，吕炜还爱着前恋人赵罗娜时，秋伟宜又无私地把招工指标让给了情敌。因而，秋伟宜形象的塑造是符合传统男性社会对“完美女性”的想象的：秋伟宜是纯洁的，在吕炜之前，她没有接触过任何男人；秋伟宜是充满诗意的，她业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写诗；秋伟宜是无私奉献的，她随时准备为吕炜做出牺牲，而且不要吕炜给予任何回报。小说叙述者对秋伟宜这个人物形象总体来看是持肯定态度的，就是说，叙述者对“完美”女性形象的想象基本还是与传统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规约相符合的，这种女性形象与张贤亮笔下的黄香久、马缨花等有相似之处，在她

① 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② 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们身上，环绕着一种母性的光环、圣母的光辉，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有“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模式痕迹。稍后她创作的《月儿好》中的明月好跟秋伟宜的形象颇为相似，明月好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被池莉刻画成纯洁、善良、朴素，并且充满诗情画意的女性形象。为了世俗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事业前途，小说中的“我”抛弃了童养媳明月好，留在了上海。因为要办理父亲遗产变卖事宜，回到老家的“我”看到了多年未见的明月好。她守寡多年，依旧“颇有风韵”“优雅”，拥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儿子在她的调教之下非常有教养；工作也颇为出色，在老家担任幼儿园的园长。因此，明月好是符合当时男性社会对“完美女性形象”的标准的一——在承担家庭妇女角色之外，还有一定的社会角色。此间，池莉小说所持的是一种朦胧而传统的“女性观点”，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具有殉道式的美丽和尊严。“女性的天空”并不是低矮的，而是广阔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积极乐观、阳光理想的气息，这与“文革”刚刚结束后人们乐观的心态是一致的，因此，池莉的写作符合当时时代所赋予的女性写作的各项标准，池莉的写作也是“清新美好”的——与男性世界所推崇的女性小说的文风非常相似，小说流露出温柔、细腻、美好的“女性气质”。几年后当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她说：“我明知我是一个尴尬的新孩子，我有一双新眼睛，我可以写一种新生活。”^① 不过，此时的池莉还并没有准确地意识到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去写，也还无法将自己和新时期其他的女作家相区别，找到自己的写作特点，因此也还无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表达她的“新眼睛”所观察到的“新现实”。

与那个理想时代、激情时代相对应，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也是坚强的、理想的（如《有土地，就会有足迹》中的吕炜），乃至充满自省意识的（如《月儿好》中的“我”），有些男性虽然身体残缺，但他们是战争英雄，他们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也是值得去歌颂和学习的（如《鸽子》中的姚叔叔）。在和女性的交往中，他们是引路人，充当的是精神导师的角色。比如在《月儿好》中，虽然“我”抛弃了明月好，但是明月好从未记恨“我”的背信弃义、世俗功利，反而始终惦记着“我”，教育她的两个儿子，他们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叔叔。尽管现实生活中这个“叔叔”在势利妻子的压制之下是多么苦闷、烦恼乃至懦弱，却丝毫不影响“我”以一个完美高大的形象存在于明月好的精神世界中，甚至成为明月好的精神支柱；《有土地，就会有足迹》中的吕炜实际上支配了两个女人的爱恋，控制了她们精神世界——

① 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赵罗娜想方设法乃至天真地幻想以身体的某种便利为代价来换取和吕炜的长相厮守；秋伟宜则适时填补了吕炜的情感空缺，又适时抽身而退；《鸽子》中的姚叔叔就更不用说了，身体的伤残和疾病使他每天度日如年，无性婚姻更挫伤他男性的自尊，但是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让原先“爱打扮”的“不正经女人”彻底“悔改”，以这种巨大的英雄力量使她心甘情愿地接过他曾经从事的“事业”——为产妇放鸽子的善举，同样拥有了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些文本中的男性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支配者。当然，这些创作是幼稚、简单化的，虽然是同样的故事情节，池莉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叙述策略则完全不同，所以池莉说“我回头看它们，它们使我脸红”^①。

如果说早期池莉的小说显示了更多的婉约气质，那么方方的小说则隐现着某种阳刚之气。说是“阳刚之气”，其实或许不如说是“伪阳刚之气”来得更为准确。这种“伪阳刚之气”多少有些模仿男性写作的痕迹，也透露出当时的女性作者试图与主流写作风格接近的努力。在方方早期创作中，其小说后来的两大群体即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阶级群体已经出现，有研究者指出：“她不是以伤痕文学的愤世立场、反思文学的忧患心态，而是以温爱的人世情怀，捕捉描写这两类阶层人物的人性亮光。”^②在方方早期的小说中，随时可以见到一个可人的年轻女性形象，她文静、诗意、上进，如《大篷车上》中的知识女孩“模样俏丽”“够味儿”，引起了汽车司机的注意。女孩的一篇文章激励了汽车司机的斗志，激发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使汽车司机改变了原来懒散、消极的生活方式。《啊，朋友》中的丁洁喜欢看书、爱安静，有远大志向，像她的名字一样“纯洁”“高洁”。这些小说反复塑造了一个符合男性世界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她们天真单纯、活力四射、聪明伶俐又不乏诗情画意，作为青春写作的文本，这些女性形象或多或少都带有方方自己的影子。

方方的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自己经历的生活，表达青春期的乐观、积极、活力，同时也不乏迷惘、困惑，也体现了她对时代的观察和认知。《啊，朋友》中的丁洁不喜欢装卸队的那些小青工，认为他们粗野、素质低，都是“流氓”。小说以小青工们看足球赛和丁洁生病为转折，青工们看足球赛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不计前嫌看望丁洁的行为表现了他们的大度、豪爽和善良的一面，这两件事情转变了丁洁对朋友们的看法，认同了朋友们的生活方

① 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② 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式，也认同了“七仙女”和那些青工不分彼此、讲义气、豪爽的性格特征。《安树和他的诗友们》中的一群大学生“乐观”“开朗”“充满向上精神”，他们以纯洁的友谊使一度低迷的待业青年吴文玉也变得“乐观”“开朗”“充满向上精神”，加入了大学生组织的文学社。以此来看，方方早期的小说是具有“青春写作”的某些特征的，充满了青春的热情、蓬勃的朝气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池莉一样，方方早期的创作毕竟还是幼稚的，那时候方方还只是在校学生，对小说中问题的解决都比较随意。比如青工们仅仅因为漂亮女孩子公开发表的一篇报道就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丁洁姐姐因为一场足球赛改变对青工们的看法，这些事件的处理方式都显得比较简单，更未涉及对人性的深刻剖析。陈骏涛先生曾指出方方早期的这些创作“由于涉世未深和艺术功力不足而显得浅露”^①。方方自己也这样认为，“我在写第一篇小说《大篷车上》时还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不仅是对文学，就是对整个人生也都是糊里糊涂的，十分单纯和幼稚……所以小说的单纯幼稚也实在是一目了然”^②。李俊国先生认为方方1985年之前的创作是“潜伏期”^③，方方自己也曾说过：“您如果不是存心想要做什么研究，就最好从1988年以后读起，倘若你本是一个挑剔的读者，读我1991年以后的那些，显得更为合适。”^④由此观之，方方自身也认为这段时间属于她的准备期，她还没有真正找到写作的感觉。此时的池莉和方方，都还未形成明确的女性意识，她们的创作大多符合男性世界所认同的女性风格而并未形成自己的特点，也并未产生明确的地域文化意识。但她们此时孜孜不倦地写作，体现出了一种为靠近主流文学而做出的努力，也为她们日后的“化蛹为蝶”积蓄了力量。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新眼睛”里的“新现实”

池莉在20世纪90年代回望自己的作品时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孩子”，她要“努力使用新眼睛”，去发现“新的现实”^⑤。她的

① 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小说评论》，1992年第10期。

② 方方：《自序》，《凶案》，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③ 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④ 方方：《为自己的文集所作的序》，《拈花一笑》，北京：西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⑤ 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确用自己独到的慧眼发现了新的现实，并且自信地宣称：“他现在怎么生活我知道。”^①这个“他”就是池莉反复阐释过的“小市民”，在池莉眼中，雷锋、鲍威尔都是小市民，因此，她的小市民实际是一个泛化了的概念。正如王又平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泛小市民论’的关键就在于‘抹平’，也就是以消除差异的方式来取消崇高和卑微的区别。”^②池莉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言说的，言说方式也比较简单——因为没有人能够离开日常生活，因此，任何一个人都是小市民。那么一个小市民是怎么生活的呢？她以记流水账的方式记录了“他”的生活流程：早起出门、上班或做生意、吃工作午餐、下午回家、看电视、夫妻交流、睡去。这是池莉所描述的典型“小市民”所拥有的日常生活，在这一阶段的池莉看来“现实是无情的”^③，人们只能顺应现实才可能得到一点收获，现实会消磨人的一切。

和写作《月儿好》《有土地，就会有足迹》时相比，小说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已经不再如“月儿好”那般纯净，也不再是“有土地，就会有足迹”的理想宣告，现实生活的“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它是疲惫、琐碎、无奈的“烦恼人生”，现实中的琐碎、浩繁、无边无际是可以淹没、消散一切的，而且自己不能左右现实，只能被现实所左右。池莉把她“新眼睛”所看到的“新现实”都融入她在1987年创作的《烦恼人生》中，然而，这篇小说的发表却并不顺利，最后才终于在《上海文学》一炮打响。因此，对有知遇之恩的《上海文学》，池莉一直怀抱一份独特的情意。在当期《编者的话》中首先推荐了池莉的《烦恼人生》，并且指出“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摇摆、选择构成了人的日常烦恼的主要内容”。和《人到中年》相比较，陆文婷常常“用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来解脱实在生活的烦恼”，印家厚却“缺乏这种气质”^④。因此，池莉所发现的“新现实”，就是芸芸众生每日所面对的真实日常生活，它“以感性的现世的日常生活的价值高出过于抽象化和过于理念化的生活的价值”^⑤。它不再有了为了事业可以牺牲生命的激情，也没有对于黄金世界的期待，它其实是“革命”之后的20世纪

① 池莉：《掩不住的新现实》，《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②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③ 池莉：《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

④ 《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

⑤ 於可训：《池莉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80年代已经面临的现实生存压力。它琐屑、困窘、无奈，但它同时也丰满、真实；它虽然不曾进入宏大历史的叙述，但它是一个人每日所拥有的全部。池莉终于用她的“新眼睛”发现了“新现实”，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了新的意义上“现实主义的骑马归来”。

戴锦华曾经指出：“在一份为涩重的柔情所浸染的《烦恼人生》中，池莉第一个以对平凡人生中的‘英雄主义’书写，改写了八十年代文学序列中对经典英雄的呼唤与虚构。”^①被池莉倾注无限心血的“小市民”伴随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宣告，裹挟着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气息，携带着一份来自大江大湖的“汉味”，终于在文学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一度被忽视或蔑视的日常生活在池莉的笔下活色生香、趣味丛生。《烦恼人生》后她又创作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不谈爱情》中她解构了永恒的爱情神话。《太阳出世》中以一个普通女性的孕育、分娩、养育小孩的艰辛过程，写出了生育在传宗接代之外的重大意义——它使男人和女人都成熟起来。日常生活所赋予人的意义凸显出来，这一切都在池莉充满了“毛茸茸的质感”的日常生活中蕴藏。显然，作家已经认识到，“烦恼人生”就是百姓生活的主体。其中虽然偶尔会有恋爱的浪漫，但大部分还是平庸的日常生活。而支撑着他们人生观的，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洒脱态度。

池莉和方方这两颗湖北女作家群中的“双子星座”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成熟的创作走向全国，方方以《风景》成名，连方方自己都坦言：“《风景》一作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待遇上以及社会影响给我带来的好处都超过我所有的作品，令我始料不及。为此我从心里感谢它的出世。”^②尽管方方和池莉都被当时的评论界划归在“新写实小说”阵营中，但是，两人的创作风格是迥然相异的。池莉对她所描述的日常生活持一种赞美的态度，她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平视的，因而一般认为池莉是“市民写作”的代表，而方方始终坚持的是知识分子路线，她对笔下的人物是审视的、批判的，方方的创作一般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如果说池莉最初让世人震惊的是因为她以贴近大地的平实放逐了理想主义的虚假狂热，展现了芸芸众生真实、卑微的生存图景的话，方方展现的则是赤裸裸的惨烈、卑贱的底层挣扎。同是记录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而方方的不同在于那不是一纸‘活着就好’宣告的，

① 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② 方方：《为自己的文集所作的序》，《拈花一笑》，北京：西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而是一声‘有谁幸福而快乐’的低问”^①。也就是说，方方虽然也写了物质生活匮乏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但是她也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具体联系到创作，韩少功认为“她就近取材，不避庸常，特别能体会小人物物质性的困窘，也不轻易许诺精神的拯救……”^②因为精神的拯救，实在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由此可见，池莉和方方对底层市民的描写，使得底层市民再次走出了被遮蔽的历史，在文学作品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新时期的湖北文学创作，在经历了一段颇为尴尬的沉寂之后，未曾想池莉和方方在前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分别以《烦恼人生》和《风景》引起巨大反响，并且被批评家纳入“新写实小说”的阵营，湖北作家几乎在一瞬间站在了文学前沿。为什么恰恰是池莉、方方的“新写实”揭开了湖北文学的新篇章呢？这或许与湖北的文化特质分不开。就如王先需先生在谈到湖北文学的崛起时曾经提到的：“湖北文学为什么会崛起也包括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相互转换的关系……社会由政治化的社会转到经济化社会，大众文化必然要泛滥开来，而湖北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合大众口味的。”^③此外，湖北文学“慢半拍”的特点其实也使她们立足于大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并写出了新的境界——远离了诗化现实的路数，也还未来得及追上现代派的步伐，而在描写普通百姓的“烦恼人生”方面返璞归真。颇有意思的是，虽然她们在创作伊始并没有着力去表现地域文化的意识，然而或许也正是因为“新写实”的原因，她们紧贴大地的创作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武汉风景、武汉风俗、汉味饮食以及日后被人们概括为“汉味”的人物形象，都已经在她们的作品中登场。在评论家和作家的良好互动中，她们的地域文化意识也逐渐明晰，乃至在若干年之后的21世纪，池莉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而重回武汉、行走在武汉城郊并创作出充满了汉味特点的作品《爱恨情仇》。

第三节 20世纪90年代：“二梅”吐芬芳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

① 戴锦华：《涉渡之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② 韩少功：《序》，《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方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③ 曾军、李骞：《王先需访谈录——文学生态中的湖北作家》，《长江文艺》，1998年第7期。